

# 试论影响当前中日关系的文化 与心理因素

刘利华

(广东金融学院公共管理系 广州 510521)

[关键词] 中日关系; 民间认知; 文化认同; 民族心理

[摘要] 在国际关系中, 人们一般总是把政治、经济和军事作为国与国关系的首要考量因素, 而把文化认同、民族心理等要素置于次要地位。但相对于前者的易变性、表层性, 文化和心理要素更能在深层次上发挥潜在的影响作用。中日作为同属东亚文明圈的两个大国, 两国关系的发展一波三折, 令人困惑。究其原因, 除却双方之间的现实利益冲突之外, 在更深层次上, 它与中日民族间的文化及心理认同的差异是分不开的。

[中图分类号] D8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099(2009)04-0056-05

## The Cultural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Impacting the Current Sino-Japanese Relations

Liu Lihua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Guangzhou 510521, China)

**Keywords** Sino-Japanese Relations; Civil Cognition; Cultural Identity; National Psychology

**Abstract** In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military power are always put in higher place than cultural and national psychology, etc. However, compared with the variability and superficiality of the former, spirit and culture of one nation play a potential role effectively. It is puzzling that the Sino-Japanese relations are always full of twists and turns, though they are the two major powers in East Asia. Besides the realistic conflict of national interest, the reasons lie on the cultural and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2007年以后, 随着双方政治高层“破冰”和“融冰”之旅的展开, 中日关系迎来了战略合作的“暖春”。2008年9月8日, 由中国日报社和“日本言论NPO”共同实施的第四次中日联合舆论调查显示, 尽管中国官民对中日关系普遍持乐观态度, 但中国受访者中对日本持负面印象的人仍占40.6%, 而日本受访者中对日本持负面印象的人高达75.6%。另据日本内阁府2008年12月6日发表的外交舆论调查结果显示, “对中国有好感”的日本人为31.8%, 与2007年相比减少了2.2个百分

点, 创下了1978年此项调查开始以来的最低点<sup>[1]</sup>。可见, 相对于中日两国的经热政暖, 中日民间认知的相互信赖感的建立还需假以时日。中日民间认知是推动中日关系良性发展的基础。当前中日双方民间互信难以建立的原因很多, 除却毒饺子、青刀豆等食品安全事件外, 还存在历史问题认识的分歧, 更存在日本社会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经济严重衰退、民众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心理加重等因素。而在更深层次上, 它与中日之间的文化及心理认同的差异是分不开的。

\* [收稿日期] 2009-06-09

[作者简介] 刘利华, 博士, 广东金融学院公共管理系讲师。

## 一 文化认同的差异是影响中日民间认知的重要原因

众所周知,中日两国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华文明浸润和滋养日本近两千年的历史。且不说古代日本“衣冠唐制度,诗书汉文章”,即使在今天,日本仍在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曾经深深地吸引并征服了日本人,他们心中的中华情结之深、之固,是今天的日本人甚至中国人都难以想象的。”<sup>[2]</sup>日本著名史学家、东洋史“京都学派”创始人内藤湖南形象地比喻中国文化为日本文化的形成发挥了“盐卤”式的点化作用<sup>[3]</sup>。“同文同种”成为我们形容中日文化交融的常用词语。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中日文化间存在差异,必须正视和了解中日文化间的差异。

首先,应当认识日本存在自己的原初文化,日本近代以前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引进是有选择的,并不是盲目的。

到目前为止,在不少中国人的认知里,日本的古代文化只不过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分支而已;日本只是一个在快速引进欧洲制度及文化遗产、顺利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上值得注意的国家。从而,日本被看成是一个没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根基的国家。不可否认,这种对日本文化不全面的认识在中国的知识界和民间都一定程度地存在着,这种认知也在一定程度上蒙蔽了我们对日本文化的全面认识。

日本存在自己的原初文化,并与吸收的外来文化相结合,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体系。就日本积极向外学习而言,日本对外国文化都是有选择地吸收并加以消化,而非盲目地引进。而且,在向外学习和吸收的过程中,日本往往都伴随产生一种悖论现象,即日本每次向外学习的结果,最后都将转向对抗。在政治、军事领域如此,在思想文化领域亦如此。

早在日本中世时期,日本在引进中国儒家思想的同时,在思想领域就创办了自己的所谓“国学”,意欲对抗中华思想。随着国学兴起,日本思想界的“模仿方向”开始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在后来呈现出两个极端现象,即:全盘日本化和全盘西化。然而,无论是日本化还是西化,持有以上两种思想观点的日本人,其目光都是从一个模仿方向上移开的,那就是被称为“汉意”的儒教思

维或大而言之中华文明。也就是说,无论是“脱亚论”或是“皇国神道论”,其对立的参照对象就是中华思想。因此,从日本文化的深层角度来看,日本民族心理的底流一直在刻意与中华文明保持一定的距离。直至今日,中日两国分属不同文明的观点在日本思想界、学术界始终存续着。

很明显,中日两国在日本文化的形成上存在着认同差异。对此,日本著名学者中村元曾经说过,“尽管中国思想具有势不可挡的影响,但它并没有原封不动地被日本人所接受。因此中国思想对日本民族的生活及思想的影响不同于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sup>[4]</sup>

其次,应当正确理解和认识中日文化上的“同文同种”和“大同小异”。

中日两国文化的渊源不可避免地造成中日之间在相互认识上存在着误区——中日两国通常都认为,两国“同文同种”,所以彼此有着深切的了解。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种虚幻的想法。日本学者山室信一曾说过,“回顾1972年日中恢复邦交以来,虽都高唱相互理解基础上的友好,但发展却未必顺利,其原因就在于先验地设定了相互认识中的‘正确答案’,结果只是高唱了理想。”<sup>[5]</sup>“当今,在国际性的交流场合,假定他国(他人)和本国(自己)的同一性,先验性地想象相互理解的实现,是蕴含着极大危险的,这本身就会成为阻塞交流的因素。”<sup>[6]</sup>长期以来,中日两国他者的相互意识中,“同文同种”以及随之衍生的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仍在阻碍着双方的交流。

回顾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在谈到中日关系时,人们常常使用“求大同,存小异”原则以求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应当注意到,这里的“大同”与“小异”指的是价值意义上的“大”与“小”,而不是对中日间实际存在着异同的描述。事实上,如果就中日间实际存在的文化异同来说,双方之间不仅存在着“大同”,同时也存在着“大异”。如果我们小看、轻视了两国间的“大异”,就不可能实现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大同”<sup>[7]</sup>。在中国的日本研究中,借用金克木先生的话来说,“我们往往只见其同,不见其异”<sup>[8]</sup>。金先生的这个判断是有一定道理的。

对中日文化差异的忽视束缚着中日双方相关学者的眼界和思路,造成对对方文化的误解。日本对华研究的勤奋和细致实可佩服,而且有不少的成

绩。但是，“终于只是把中国当作资料，见树木不见森林，戴着日本眼镜解说。”<sup>[9]</sup>这种情形时至今日依然如故。

坦率地说，这种中日文化认同的差异和误区影响着中日两国民众的相互认知。

## 二 民族心理是影响中日民间认知的重要因素

日本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孕育了日本民族心理的两面性。日本哲学家、文化史学家和辻哲郎把日本民族的性格归结为具有双重性的“台风性格”，“这种性格表现为时而彬彬有礼、温文儒雅，时而残暴凶狠、暴虐成性”<sup>[10]</sup>。日本也因其既生性好斗而又温和谦让，既穷兵黩武而又崇尚美感，既桀骜自大而又彬彬有礼，被一些学者戏称为“双面影人”<sup>[11]</sup>。日本民族心理的两面性也是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

(一) 日本民族心理的两面性在对华认知上的双重表现

在日本对华认知上，日本民族心理的两面性突出表现在日本人在自卑感与优越感之间不断徘徊。当日本认为自己处于优越地位时就会表现出对中国的蔑视，反之一旦自己停滞时，不仅出现“中国威胁论”，在他者认识中甚至还隐藏着期待中国崩溃的阴暗心理。冷战结束后伴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日本对华亲近感却不断下滑，这种现象与日本民族心理的潜在影响有关。

日本学者加藤周一曾经说过，从古至今，日本人的外国观有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强调日本的落后，而去理想化特定的国家；第二种类型是强调外国的落后，而将日本自身理想化<sup>[12]</sup>。日本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外国观都曾反映到中国身上。

明治维新前的 2000 多年里，日本曾把中国视为最高的价值标准而崇拜。之后，又曾在“文明开化”、确立日本民族的认同时，为树立自身的“文明国家”形象而刻意诋毁中国。纵观近代以来日本人的对华认知，在日本人心中，虽然承认甚至崇拜中国的传统文化、古典精华，但却对近代中国的落后感到非常的失望。直至今日，“日本人都喜爱古代的中国。……但是，一提到当代中国，他们往往持鄙视的态度。”<sup>[13]</sup>据著名汉学家江藤新吉所言，日本人对于中国的态度可用一种爱恨交织的综合情绪来表达，“当日本人认为中国软弱无能

时，它们就强调这种爱恨情结的恨的一面，变得十分傲慢；当日本人认为中国更强大时，它们就强调爱的一面，变得相当的卑躬屈膝。”<sup>[14]</sup>这也是日本民族尊强歧弱心理的体现。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极大地改变了日本人的中国认知。围绕着不断变化的中国形势，日本出现了新的“世代间的断裂”的状况，即使是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也对日新月异的中国感到困惑。诚如日本学者高原明生所言，“现代中国广阔、多样、急剧变化，怎样去认识，常常是日本研究中国问题学者的烦恼。”<sup>[15]</sup>有着浓厚危机意识、自卑感和优越感相互交织的日本人在对华认识上呈现出焦躁与困惑的状况，现实中矛盾重重的中日关系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反映了日本民族的这种对华心态。就目前而言，在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济尚未全面恢复的情况下，又发生了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接下来日本将面临的是经济陷入负增长的局面。企业倒闭、失业人口增加、政治不稳定，这些都将加强日本老百姓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心理，从而表现出对中国“没有好感”。

(二) 消除中日民族心理中的彼此自卑感是增强互信的关键

加强互信是改善中日关系的关键，而加强互信的关键是要消除中日民族心理中的彼此自卑感。从民族心理的角度来看，在中日建立互信的过程中，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双方要逐渐消除对对方抱有的心理上的自卑感。坦率地说，日本在包括经济、法制、国民生活、卫生等在内的社会状况方面，对中国怀有一种优越感，但是对中华文明以及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风采又怀有一种自卑感。与此相反，中国方面因为自己的悠久文明和国际政治领域的地位以及作用，对日本怀有一种优越感，但对自己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又怀有一种自卑感。中国人的自卑心理与近代史上的屈辱遭遇是分不开的。目前，日本从中国经济的崛起中感到了威胁，而中国又担心日本成为政治大国，这与中日相互怀有自卑感，又害怕失去各自的优越地位有很大关系。因此，消除自卑感是改善中日关系必须克服的心理障碍。

综上所述，文化上的认同差异和相互认识上的心理误区使中日两国难以做到透彻地了解对方，甚至存在许多误解，这是当前中日关系的一个突出特点。因此，加强中日之间的国民交流，增强互信是

改善中日关系的必由之路。

### 三 全面了解和认识日本以及促进中国的进步发展是推动中日关系良性发展的关键因素

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国与国之间虽然仍然存在着竞争,但竞争已不是国际关系的全部内容,现实中的中日两国已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中日经济存在很强的互补性,合作的潜力很大。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中日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俱伤”,中日关系交恶的最大受害者,是当事者双方本身。鉴于中日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和日本民族心理的特殊性,在中国如何推动中日关系继续向良性方向发展方面,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

首先是理性地全面认识和了解日本民族。

不管人们对日本的感情是蔑视还是敬慕,不可否认的是,日本是一个具有特殊的民族心理特征和特殊的历史文化的国家。日本人成功地把以强烈的集体主义为美德的社会纪律,同西方人习惯看作与个人主义不可分的那种责任感结合起来,其程度是任何其它国家无可比拟的<sup>[16]</sup>。这一点已为日本自身的成功发展所证明。

日本是一个“较真”的民族,像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攻击,他们精确统计到每一个遇难者。这告诉我们处理与日本关系时,要增强“定量分析”工作。只有这样,在历史问题的较量上,中国观点才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丧失说服力。

日本或许真的“欺软怕硬”,但怕的是真的硬。所以,中国必须先让自己真正强大起来,这才是树立民族自尊的最佳途径。曾有一个日本研究者开玩笑似的说,日本曾经抱过中国的大腿,后来抱了美国的大腿,等中国将来变强大了,说不定还会来抱中国的大腿<sup>[17]</sup>。可以说如今的中日两国关系已不是谁统治谁的问题了,客观上两者都没有让对方抱自己大腿的绝对实力。

我们必须理性客观地认识日本。一个国家的形象是多元的,历史问题不是日本的全部。“中日关系

不能忘记历史,但是必须努力超越历史。”<sup>[18]</sup>经过战后60多年的发展,日本社会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曾经是强行加给日本社会的西方民主和法制,已经成为日本人生活的一部分。在这个社会中,有一部分人放开嗓门呼喊过去的那场战争不是侵略战争,也有一部分人站出来自费帮助中国劳工、细菌战受害者和日本政府打官司。因此,当代的日本社会就是这样一个多层面的有各种变量的存在。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加深国人对于日本民族的认识,以理性客观的态度正确看待中日关系的发展尤为重要。

其次,中国的进步和发展是推动中日关系良性发展的关键因素。

面对日本这样一个存在多重变量的社会,问题的关键在于什么样的力量推动它向哪一个方向发展。冷战后,尽管日本对华外交中加强了防范、遏制中国的一面,但其对华战略的最终定位还存在变数。那么,我们能够推动中日关系向良性方向发展的力量何在?

根本的答案在于中国的发展和进步。日本民族的趋强性以及日本外交中“与强者为伍”的原则告诉我们,这是推动中日关系向良性发展的根本因素,也是解决当前中日问题的最终答案。有鉴于此,中国必须充分利用当前这一战略机遇期,排除一切干扰,迅速发展和壮大自己,增强综合国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因此,今后处理中日关系,总体上还是要坚持从长远战略出发,贯彻好“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加强友好交流与合作,着力寻求和扩大共同利益。对于两国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双方都需要冷静、理性地对待,坚持通过友好协商,寻求符合双方长远和根本利益的妥善解决办法。

“中日友好”是在论及中日关系时我们时常听到的字眼,也是中日两国人民追求的共同目标。友好是要在差异中克服、调整,在交流中互相理解,互相尊敬,才能慢慢达成的境界。要把中日友好推向前进,达到一个真实的境界,它要求我们必须深入探讨问题,找出问题的原因,并为克服这些问题做出努力。然而,这一切的起点是我们必须首先相互了解,相互认识,正确认知彼此间的差异。

#### 【注 释】

[1] 《调查显示 66%的日本人对中国没有好感》,《参考消息》2008年12月8日。

[2] 韩东育:《日本近代新法家研究》,中华书局,2003年,第384页。

[3] 〈日〉内藤湖南著, 储元熹译《日本文化史研究》, 商务印书馆, 1997年, 第 7页。  
 [4] 〈日〉中村元著, 林太、马小鹤译《东方民族的思维方法》,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9年, 第 234页。  
 [5]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主编《中国与日本的他者认识——中日学者的共同探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年, 第 17页。  
 [6] 〈日〉正村俊之著, 周维宏译《秘密和耻辱——日本社会的交流结构》, 商务印书馆, 2004年, 第 324页。  
 [7] 同 [5], 第 1页。  
 [8] 金克木:《文化的解说》,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 第 165页。  
 [9] 同 [8], 第 22页。  
 [10] 刘炳范:《战后日本文化与战争认知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 第 10页。

[11] 高兰:《双面影人——日本对中国外交的思想与实践 (1895—1918)》, 学林出版社, 2003年, 第 1页。  
 [12] 〈日〉南博著, 邱淑雯译《从明治维新到现代日本人论》,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 第 313页。  
 [13] 〈日〉加家美光:《期待加强民间文化交流》, 《参考消息》2007年 10月 3日。  
 [14] 〈德〉杜浩著, 陈来胜译《冷战后中日安全关系》,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4年, 第 264页。  
 [15] 《日本专家称优越感误导日对华研究》, 《环球时报》2007年 12月 27日。  
 [16] 〈美〉罗伯特·克里斯托弗著, 马泉译《日本精神》,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8年, 第 234页。  
 [17] 晋林波:《以现实利益重塑中日关系》, 《南方周末》2006年 9月 28日。  
 [18] 同 [5], 第 191页。

【责任编辑: 邓仕超】

(上接第 26页)

[19] 新加坡首任外长拉惹勒南 1966年 7月 30日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演讲, Chan Heng Chee & Obaidullah eds., *The Prophetic and the Political: Selected Speeches and Writings of S. Rajaratnam*, Singapore, 1987, p. 491  
 [20] *The Straits*, 29 November 1996  
 [21] Lee Kuan Yew, *The Singapore story: Memories of Lee Kuan Yew*, Singapore Times Editions Pte Ltd and The Straits Times Press, 1998, p. 22  
 [22] *Ibid.*  
 [23] 蔡俊华:《李光耀诚对中港台》, 新加坡胜利出版社, 2000年, 第 29页, 转引自魏炜的博士论文《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外交研究 (1965—1990)》, 未刊稿, 第 14页。  
 [24] Christopher M. Dent, *The 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of Singapore, South Korea and Taiwa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2002, p. 61.  
 [25] *Ibid.*, p. 62  
 [26] 新加坡《联合早报》编《李光耀 40年政论

选》, 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集团, 1993年, 第 119页。  
 [27] 同 [19], 第 211页。  
 [28] 亚历克斯·乔西:《李光耀》, 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 62页。  
 [29] 同 [19], 第 211页。  
 [30] 同 [14], 第 75页。  
 [31] S. Jayakumar “Keeping Sight of the Basics in our Foreign Policy”, *Speeches 97: A Bimonthly Selection of Ministerial Speeches (July - Aug.)*, Singapore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the Arts, 1997, p. 50  
 [32] *Ibid.*, p. 5  
 [33] *Ibid.*, p. 15  
 [34] 黄根成:《新加坡的外交政策以国家利益为重》, 载新加坡《行动报》1992年 2月号第 11页, 转引自魏炜的博士论文《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外交研究 (1965—1990)》, 未刊稿, 第 48页。  
 [35] <http://www.gov.sg/>, Mar/2006

【责任编辑: 郭又新】